

张明澍◎著

中国“政治人”

● 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

中国“政治人”

——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

张明澍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政治人/张明澍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2
ISBN 7-5004-1503-6

I. 中… II. 张… III. 政治文化—研究—中国 IV. D66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4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7.00 元

D43562

序

于光远

看了这本书的目录和“序：什么是中国政治人”并对全书粗翻了一下，觉得这是一本有价值的书。作者在“序”中写道，“做社会科学研究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逻辑的方法，即通过推理得出结论的方法，另一种是实证的方法，即通过实际材料来显示、证实结论的方法。本书的做法是尽量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对社会科学研究基本方法的这一种概括，我不想多做评论，我只是认为，用现代社会学的问卷方法搜集资料作为分析依据的做法不失为研究社会科学的一种可取的方法。不过这种研究要成为真正有意义的，就必须在制订问卷前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把握得好，并在搜集到资料之后，很好地进行分析。我觉得本书作者是注意到“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推理，以便使资料所含的意义充分地展现出来。”这样，这本书本身就避免了只是资料的堆积，使得它有生动明快的内容。

当然，这本书为自己设置的那几条任务——勾画中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态度；说明中国公民与西方公民政治态度的不同特点；描述中国公民参与行为的特征；揭示中国公民政治参与中的矛盾心态；评价中国公民的政治素质等等——都是很难做出完全恰当的结论的。而且我认为，这也不是通过一次两千多份问卷可以完成的。但是这是一种提供了判断的根据、因而是可以客观地评价所得的结论的方法。实证方法的意义主要也在这里。从掌握实证方法进行分析推理来说，我认为这本书是比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

这本书的写法采用了读者欢迎的报告文学语言，使得读者看这样一部科学著作不感到枯燥，我粗读之后，感到是很成功的。

因为书稿付印在即，我来不及细致地阅读和深入思考。为了对年轻同志表示支持，匆匆地说了上面几句话。如果有不恰当的地方，还要请读者和作者原谅。

目 录

序 什么是中国“政治人”	1
0.1 政治人	1
0.2 政治素质	3
0.3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政治人	8
0.4 怎样研究中国政治人	11
第一章 中国政治人眼中的政治	13
1.1 政治是好事还是坏事	13
1.2 政治是少数人争权夺利还是管理人民大众的事	18
1.3 政治是领导的事还是大家的事	21
1.4 “扬善”的政治和“抑恶”的政治	24
第二章 中国政治人的政治意识	30
2.1 政府对我的影响有多大——政府影响意识	30
2.2 堵车怨谁——政府责任意识	33
2.3 怎样才不会再发生“文革”——人治和法治的偏好	37
2.4 书记做得对不对——重视结果和重视程序	41
2.5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政策取向和制度取向	45
第三章 中国政治人的选举行为	49
3.1 公民投票时的心态	49
3.2 你还记得上一次选举吗	55

3.3	你想不想了解候选人	59
3.4	你想不想当人民代表	61
第四章	中国政治人的参与行为	65
4.1	“莫谈国事”与关心国家大事	66
4.2	物价高了怎么办——旨在影响政府政策的参与行为	72
4.3	敢怒而不敢言——路见不平的想法和表现	78
第五章	中国政治人对参与方式的偏好	85
5.1	你觉得游行是最好的方式吗	85
5.2	你会参加游行吗	92
5.3	依靠领导，依靠组织——多数人喜欢的参与方式	97
第六章	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知识	105
6.1	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是谁	106
6.2	“党政分开”的意思是什么	110
6.3	政治知识的来源	117
第七章	“敬而远之”——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	126
7.1	实际政治参与经历	127
7.2	对待政治的最好态度是什么	133
7.3	“敬而远之”——对立而又统一的基本政治态度	138
7.4	“君子言义不言利”——敬而远之的主要原因	145
第八章	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素质评分	151
8.1	政治素质的构成及评分方法	154
8.2	4.9分：中国城市政治人的政治素质评分	158

8.3	4.9 分的含义及其与美国、英国政治人的比较	171
第九章	形形色色的中国政治人	175
9.1	不同教育程度的中国政治人	176
9.2	不同职业的中国政治人	178
9.3	不同年龄的中国政治人	179
9.4	不同政治身份的中国政治人	181
9.5	3.1 分:中国农民的政治素质评分	184
9.6	3.3 分:中国公民政治素质总评价	189
9.7	结束语:“路漫漫其修远兮”——从中国公民政治 素质出发的民主化进程	191
附录	调查问卷	199

序 什么是中国“政治人”

0.1 政治人

1962年，一个美国科学家调查小组向一个被调查者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假设一项法令正在考虑中，而您认为该法令极不公正或者有害。您想您可能做些什么呢？”这位退休邮电工人耸了耸肩，回答说，“我可以组织正式的团体，或者鼓动朋友和邻居，一起写抗议信或签署请愿书。”在这个小组的调查对象中，做这类回答的大约有56%。而一个墨西哥妇女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时，则显得有点困惑，她停顿了一会，似乎在考虑，然后有点茫然地答道，“不知道。我连个聊天的人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该干什么。”差不多有48%的墨西哥被调查者的回答跟这位妇女相似。27年之后，1989年，当一组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在调查中问道，“假如您认为政府的某项决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您会不会想到自己可以做些事情影响政府的这项决策，如果会的话，会采取何种方式？”大多数被调查者（30%，其他回答远少于此数）不假思索地答道，“向本单位领导或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这是三种不同的政治特征，换句话说，是三种“政治人”的答案。

社会科学家，严格地说，政治学家，使用“政治人”这个“人”字的方式，跟新闻界用的“门”有点相似。从1972年美国

共和党在竞选期间非法进入民主党总部窃取情报闹出水门事件之后，记者们便在所有的政治丑闻后面都加上一个“门”字，于是什么“伊朗门事件”，“国会门事件”便层出不穷。人是万物之灵，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精灵，他身上不知道有多少解不开的谜。孟子说，“食色，性也”，人皆有食色二性，这是人的生物特点；人都要挣钱谋生，要计算油盐柴米，希望自己的钱能够多一点，这是人的经济特点；人还知道礼义廉耻，有憎恶之心，有侧隐之心，亦有向善之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人的道德特点；人又都有点权力欲，不论大小，总爱当个领导，这是他的政治特点……社会科学家为了把人身上这些方方面面的特点研究清楚，把自己的理论说得生动一些，就在研究人的某个方面特点的理论后边加了个“人”字。比如亚当·斯密研究人的经济特征，就说“经济人”，西蒙研究人的行政特征，就说“行政人”，还有社会学家研究人的社会特征，就说“社会人”。1960年，曾经当过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主席的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写了一本书，专门把人的政治特征作为政治发展的基础来研究，这本书的名字就叫“政治人”。所以，准确地说，政治人就是人的政治特征的形象而生动的说法，中国政治人就是我们中国人政治特征的形象而生动的说法。

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政治人只是他的一个侧面，是他的特征的一部分。但单单这一部分就已经是一个无限复杂的大千世界。比方说权力欲，在机关单位有，在社会组织有，甚至在家里也有；再比如说参与欲，从布什下台，克林顿上台，德国合并，苏联解体，海阔天空地聊，直到学习讨论，选举投票，都在参与之列，都是人的政治特征的表现，是政治人的面面

观。但是,作为了解来说,我们不可能全知道;作为研究来说,我们不可能全包括。我们要了解,要研究的,只是中国政治人的最主要方面,是我们最关心的方面,这个方面,就是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素质。

0.2 政治素质

素质这个词的涵义比较微妙。《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素养”。这个解释解决不了大问题。实际上,素质可以说是相对于某一种客观需要而言的人的主观能力。乡下来的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路走一路出洋相,大吃大喝一顿之后大泻了一通肚子不说,最后竟然跑到大观园中的太上皇宝二爷的卧房里睡将起来,结果传下了一个“刘姥姥进大观园”的著名笑话。这个笑话表现了刘姥姥的主观能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刘姥姥是个乡村老妪,她享受不了大观园奢华的客观环境。西方人听歌剧,穿着礼服打着领带,毕恭毕敬;我们同胞看歌剧,时常有人磕瓜子,聊大天,对此,最常听到的叹息就是素质不行,意思是说这些人没有能力欣赏咏叹调唱起来尤如鬼哭狼嚎一般的西洋歌剧。体操队收运动员,先要测一测身体素质,目的是看候选的运动员有没有能力胜任体操这项运动。现代政治是民主政治,它的基础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没有公民的参与,整个政治制度就无法运行起来。拿中国来说,我们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公民直接选举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是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而同级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如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是由同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所以，尽管有好几级的选举是间接的，但整个政府毕竟是在公民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最基层的公民选举，整部政治机器就无从建立，也无法运转。可见，公民的参与对于现代政治来说是何等重要。政治素质，就是指公民参与政治的主观上的能力。

政治素质大致上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政治观念，或曰政治参与态度，简称参与态度。它是政治素质的核心部分，在政治素质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包括政治信仰，政治理想，对政治本身看法，即对政治的价值评价，以及对参与政治的态度和政治意识。中国人信仰马克思主义，美国人信仰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康有为的政治理想是达到“大同”的社会境界；张三觉得政治是一件好事情，李四觉得政治是一件坏事情，还有王五觉得政治是一件不可缺少的坏事情；有人认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有人认为应该离政治远点，这些都是政治人价值观的内容。总起来说，政治观念就是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待政治？怎样对待政治参与？不过，政治观念的内容也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区别。一般来讲，政治信仰和政治理想不大影响人的参与欲望。毛泽东跟尼克松，政治信仰和理想可谓差之千里，但两个人参与政治的态度却都是很积极的；就是说，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和一个人信仰资本主义的人，政治目的可以很不相同，但却可以同样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儒家主张入世，道家主张出世，这两家看起来对政治参与是有些影响的，不过这是宗教上的信仰，跟政治上的信仰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把它们作为政治素质的组成部分。不能说一个信儒家学说的人政治素质就高，一个信道教的人政治素质就低。与之相应的是，对政治本身的看

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一个觉得政治是“好事”的人和一个人觉得政治是“坏事”的人，其在参与上的差别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当然，对政治参与的态度就更直接地表现了一个人的政治素质。比如说，选举你愿不愿去？是不是认真地参加？愿去，或者不愿去；认真，或者不认真，大体上就可以跟政治素质的高低划个等号。政治意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不过它许多时候影响的不是要不要参与，而是参与的取向，即往哪个方向上参与。这个问题稍嫌复杂，我们在第二章要专门研究。

政治素质的第二个部分是政治知识和政治技术。这一部分回答的问题是：你对政治和参与知道什么？参与政治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和技术。1979年10月的《人民日报》报道过这样一件事：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一位名叫蒋爱珍的上海女知青，跟本团男性张某关系较好，在文革派战中与张结下宿怨的谢某、李某借此诽谤蒋、张二人有不正当关系。上级派来的调查组组长恰与张也有矛盾，于是同谢、李二人沆瀣一气，对蒋的诬蔑反而升级，并欲以组织名义对蒋“严肃处理”，蒋情急之下，开枪打死造谣的李某等三人，结果被判处徒刑。事后有不少人写信到报社对蒋表示同情。蒋的遭遇的确是值得同情的，但从政治素质的角度看更令人遗憾，因为她太缺少运用政治参与知识和技术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能力。虽然“文革”期间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很不健全，但毕竟还是有很多渠道可以利用的。“文革”后期有个有名的“李庆霖上书”事件。李庆霖是福建一个中学教师，儿子在农村插队，由于当地政府关心不够，生活艰辛，以至于到了没有一角五分钱理发的程度。李某人巧用心计，写了一封信，通过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同乡，辗

转带给王海蓉，由王海蓉交到毛泽东手中。于是就有了轰动一时的毛泽东的回信，“寄上三百元，聊解无米之炊”。不仅李的儿子的的问题得到解决，全国知识青年的待遇都由此有了很大改善。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参与知识和技术的重要性。政治知识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关于政治制度的知识，比如政府有哪些主要部门，各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它们之间如何分工。第二是关于政治过程的知识，就是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才能够有效地影响政策的制定。第三是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知识。第四是背景知识，要在哪方面参与，就要具备那方面的知识。参加选举，就要了解候选人的情况；想对政府的外交政策发表意见，就要有相应的国际知识；想要影响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就要具备有关环保的知识。政治参与的技术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本的参与技术，第二个层次是参与技巧。参与技术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能够正确地行使公民的权利；参与的技巧则是可以灵活地运用公民权利以保护和追求自己的利益。拿上面的例子来说，蒋爱珍对于参与，不仅没有达到技巧的层次，简直是连基本的技术也没有；而李庆霖则不仅有参与的技术，而且还有很高的技巧，他懂得把正式的参与途径与非正式的途径结合起来。

政治素质的第三个部分是参与经历。一个公民有了参与取向的政治观念，有了必要的参与知识和技术，但若是缺少参与的实际经验，他的参与也可能是不成功的。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一个人处在李庆霖的位置，其实有许多途径可以选择：他可以去找本单位或本地方的领导反映；也可以给报社和电台写稿；他甚至可以写一封信，像有些人做的那样，大书“北京，毛泽东主席收”几个字，贴上八分钱邮票扔到邮筒里去；如果

是在今天，他还可以去公安局申请游行……这么多方法都是合理合法的，选择哪一种最有效，就要靠经验了。如果当时李选择写信给报社，他很可能马上就成了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现行反革命。成功的参与需要妥协。比如，政府因为财政收入的困难，希望提高某项公用服务的价格；而你不愿意多掏钱，那就可以通过政治参与来沟通，写信，找人，向政府反映你的愿望，都可以。但最后可能要妥协，政府少提一点价，你也容忍一点，这样解决问题，参与的目的就算达到了。但怎样才能达到体面的妥协，实现成功的参与，这就需要有实际的经验。参与还需要服从。比如选举。你希望的候选人没有当选，选上的恰好是你最不喜欢的人，怎么办？尽管你可以继续用合法的方式劝说别人下一次不要再选他，但现在你必须服从他，认认真真地执行他做出的决策，承认他是你的代表。这样才是正确的参与。这种“输得起”的服从精神，也只有在长期的实际参与中才能形成。

政治观念，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技术、参与经历三个部分构成了公民的政治素质，然而这三个部分的作用却不完全相同。大致来说，在公民的政治素质中，价值观决定公民愿意不愿意参与，知识和技术决定公民能不能参与，经历影响的是参与的效果和效率。这几个方面有时候可能是脱节的。美国学者的一项研究指出，有些受过很高教育的公民，可能掌握比较充分的政治知识和技术，但是，他们的观念却使得他们缺少积极的政治参与。这种情形，在原东欧国家如东德、捷克是比较普遍的。我们还可以补充指出，在一些经济处于起飞阶段，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的社会，往往有少部分人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参与与激情相当高涨。但由于这些社会的政治教育还没有来得及

向他们教授必要的参与知识和技术,而经济和文化的不发达使社会又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向他们提供可以锻炼自己的充分的参与机会,所以他们既缺少参与知识和技术,也缺少参与的经验,因而在高涨的参与欲的驱动下,常常会表现出超出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缺乏节制的参与行为,给该社会的政治发展带来不稳定因素。我们在本世纪 60、70 年代以至于今天,常常可以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看到这种现象。

0.3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政治人

首先因为这是一种有趣的知识,是我们中国人了解自己的重要方面之一。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我们中国人又尤其是政治动物。我们大约是世界上最早有大规模政治活动的民族之一。从大禹治水的时代开始,政治这个神秘的东西就悄悄地溶进了我们民族的血液,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一提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关心国家大事”这些在不同时代形成,但其意义却是一以贯之的新的和老的格言来,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就禁不住热血沸腾。试想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什么没有跟政治联系在一起呢?美国人可能为一个电影明星而欢呼,巴西人可能因一场足球赛而狂热,日本人可能对一个百万富翁而激动不已,但真正能使所有中国人激动起来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政治。如果中国人身上没有这种独特的政治基因,你就无法解释“文化大革命”这样显然缺乏合理性但却是世界上最壮观的政治运动为什么能唤起差不多全体中国人参加。所以,可以说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关心政治的或者说是最政治化的民族。这当然未必是缺点。在

这里我们关心的是，我们中国人在政治上有哪些特点？与世界上其它人相比较，比方说跟美国政治人，跟日本政治人，跟法国政治人，跟印度政治人相比较，我们有什么不同之处？

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素质是社会主义取向的，美国政治人是资本主义取向的，性质不同，我们当然不能把二者拿来作简单化的比较。但是，假如我们把政治素质中涉及到价值的那一部分暂时地放到一边，来对其它内容做技术性的比较，那倒未必是不可以一试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政治知识，看看是美国人对美国政治制度了解得多一些，还是我们中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了解得多一些；还可以对参与技术，参与经历做比较。对政治素质做过一些可能的比较之后，我们还可以再对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之处进行比较。这样把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情况的比较结合起来进行，我们得到的启发，较之把两个方面分开来比较有可能会更大一些。

其次，研究并且了解中国政治人，对于制定中国政治发展——或者说中国政治改革，或者说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政策，或者评论这方面的政策，乃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人的政治素质属于主观的东西，而政治制度则是客观的东西，后者决定前者但又受前者的影响，在有些时候，前者也有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又是很正确的。在中国人政治素质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美国式的政治制度；反之，在美国人政治素质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建立中国式的政治制度。柏拉图在两千多年前就注意到了人的素质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他想像人是神用金、银、铜、铁这几种不同的质料造成的。每一种人都适宜于一种特定的制度。他说用铜和铁造成的人就不适宜于民主制度，他们只